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两个凡是」的歧路
「两个凡是」引发的党内斗争
拉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尖锐对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上）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下）
重树实践标准的权威

思想冰封 的解冻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Sixiang Bingfeng
De Jiedong

张润枝 刘 硕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思想冰封 的解冻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Sixiang Bingfeng
De Jiedong

张润枝 刘 硕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绍雄

装帧设计 丁 明

思想冰封的解冻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张润枝 刘 硕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 23006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90 千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212-01581-4/D·271

定价 13.00 元

印数 00001-1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凡是”的歧路	1
一、“两个凡是”登场亮相	1
二、“两个凡是”的 历史 渊源	6
三、华国锋与“两个凡是”.....	13

第二章 “两个凡是”引发的党内斗争	28
一、小平出山.....	28
二、“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37
三、大力提倡实事求是.....	46

第三章 拉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	52
一、批判“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52
二、大讨论的前奏.....	61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前前后后.....	69
四、历史雄文的精华.....	83

第四章 “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尖锐对立	90
一、从“吴冷西来电”说起	90
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97
三、罗瑞卿鼎力相助	107
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111

第五章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上)	119
一、哲学界一马当先	120
二、实践标准的深化	127
三、自然科学家加入讨论行列	156
四、众人拾柴火焰高	164

第六章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下)	177
一、对实践标准的最初呼应	178
二、邓小平东北谈话	189
三、地方“诸侯”纷纷表态	198
四、人民军队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	208
五、《红旗》最后“卷入”	211

第七章 重树实践标准的权威	218
一、面对面的交锋	218
二、“实践标准”的全面胜利	229
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232

第八章 大讨论的总结与启示	243
一、历史不会忘记	243
二、二十年后的启示	250

主要参考书目.....	263
-------------	-----

第一章

“两个凡是”的歧路

一、“两个凡是”登场亮相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集中体现了华国锋的政治指导思想,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社论重申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指出,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属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

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同时,社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强调坚持毛泽东的思想路线,是保证我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学好文件抓住纲》的发表,尤其是“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向全党全国表明了华国锋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原则,也表明了他把自己作为毛泽东遗志的继承人,在维护毛泽东的同时竭力树立个人权威的政治意图。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其本人也缺乏足够的胆识和魄力,在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片面地认为,既然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论路线。殊不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如实地指出并纠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能解除人民的疑虑,增强党的号召力,领导中国摆脱十年浩劫带来的巨大灾难,走上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两个凡是”思想的指导下,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华国锋作了长篇讲话,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要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必要性,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

成果,并再次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进而为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制造障碍。声称,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他还根据一个所谓“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假案材料,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成为华国锋向全党推行其“两个凡是”指导思想的会议,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旗号下为正在进行的拨乱反正制造障碍。

华国锋提出的旨在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个凡是”的思想,说到底,是要维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7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认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是为了进一步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武装我们的头脑,为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奋斗。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国锋撰写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华国锋这样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经过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了我们的党,武装了广大群众。由于有了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党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下,及时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没有能在

我国重演。我们党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事实表明，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必然坚持这一理论而不可能从思想路线、理论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去自觉地否定“文革”，并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被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他总结了揭批“四人帮”斗争取得的初步成果，揭露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行径，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并重申了全党在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是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报告仍然坚持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加以发展。报告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认为：“如果说，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营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么，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革命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为此,华国锋强调全党要坚持“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在坚持上述理论的前提下,华国锋错误地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他没有否定反而极力宣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声称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围绕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展开的,而粉碎“四人帮”正是中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的标志。由此,他得出结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至此,华国锋在“两个凡是”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三个坚持,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还要继续开展下去”的判断;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华国锋的上述思想在中共十一大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表明这次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任务。也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左”倾思想,其结果必然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发展蔓延,导致拨乱反正工作的停滞不前,甚至当国内国际形势适合的情况下,还存在着重演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危险。因此,及时批评和纠正“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纠正长期以来盛行于党内的“左”倾思想,已经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

二、“两个凡是”的历史渊源

1. “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

前文提到,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是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的。但奇怪的是,“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与此文章的撰写,就连当时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也蒙在鼓里。此文是由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粉碎“四人帮”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理论组组长)领导的理论学习组起草,经李鑫多次修改,由华国锋亲自审定而成的。“两报一刊”只是按照汪东兴的批示登出来罢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当时能够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社论,即具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特殊分量。华国锋正是利用“两报一刊”作为党报党刊的重要地位,把“两个凡是”的思想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大大加强了它的政治影响力,为后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做舆论准备,进而使其成为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追根溯源,“两个凡是”并非华国锋的独创,其始作俑者,当推林彪。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总结。会上,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前一段的工作对毛泽东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毛泽东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坦言:“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然而,林彪在会上却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话,称最近几年发生的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

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由此,他提出凡是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去做就胜利、就前进,凡是违背毛泽东的教导就失败、就遭挫折的观点。这恐怕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不幸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对这种明显别有用心的阿谀之辞加以制止,他的默许使林彪、“四人帮”等变本加厉,于“文革”开始后公然提出,凡是反对毛泽东的就是阶级敌人,就是反革命;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是修正主义,并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口号,企图借助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他们的篡权阴谋提供庇护。然而,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观念仍然在少数中央领导人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

1976年11月18日,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继续办“四人帮”树立的样板学校——朝阳农学院,继续放映由“四人帮”炮制的以“批邓”为主题的电影《决裂》等,坚持说,这些都是“毛主席讲过的”,“毛主席指示过的”,不会错!

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时又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甚至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误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这些论点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但也的确迎合了华国锋借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意图。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的工作汇报后,针对当时群众所表达的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愿望,提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四点意见:第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第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第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年1月21日,在他的讲话草稿中又出现了以下语句:“凡是毛主席

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个意思经加工后,出现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就形成了著名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个指导方针,违背了广大干部群众渴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彻底纠正“文革”错误的愿望,使一度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2.“两个凡是”出台的直接动因

任何国家大政方针的出台,除了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外,还往往要针对着社会中的某种现实问题,“两个凡是”也不例外。它的出现,直接针对的就是如何阻止邓小平恢复工作,阻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文革”开始后即被当作“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的邓小平曾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复出,于197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重新受到毛泽东的信任。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病势加重,邓小平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并着手对陷于混乱状态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论及著名的“三项指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充分利用了这三项指示,在国家危难之际,迅速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进行整顿。他多次强调,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工作中要注意安定团结,反对拉帮结派,要落实对老干部、劳动模范、老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国家建设。并以整顿铁路运输为突破口,对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整、整顿。短短几个月时间,这次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国家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武斗得到制止,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但是,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不可避免地触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方针

政策,触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逐步发展为对“文革”错误的系统纠正,这既遭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又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1975年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谗言,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件为由,指责邓小平偏袒支持刘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然而,几个月来,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整顿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广大干部群众开始从长期“左”倾思潮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认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长期郁积在人们心中的怀疑、愤懑与忧虑的总爆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这位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伟大人物,多年来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长歌当哭,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悼念周总理,表达失去伟人的悲痛心情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但是,“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性悼念活动,这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从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地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准备利用清明节祭祖的传统习俗,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3月底,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大批群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敬献花圈、朗诵诗词、发表演说,倾诉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怒。其中一首诗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将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这一切,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度恐慌。4月4日,在他们的操纵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反革命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的严重逆流”,“反革命借此煽动群众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会议还决定采取措施,清除广场上的花圈、标语。5日,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大批群众遭到殴打和逮

捕。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场以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就这样被压制下去了。但是,这场运动表明了人心向背,表明了人民热切盼望我们的党能从“左”的错误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面临着全面纠正“左”倾错误,全面进行拨乱反正的重大任务。其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邓小平代表了一批在“文革”中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代表了全面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方向,承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也就等于承认“文化大革命”政策、理论、方针的全面错误,承认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错误。对此,作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华国锋,是决不能容忍的。1976年10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有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就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此后不久,汪东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说:“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的一套。”“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可以说,华国锋等人借以阻止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最表面、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两个凡是”。通过“两个凡是”,华国锋一方面利用人们对毛泽东的朴素感情,强调批邓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是不会错的。另一方面,又充分表现了他才是毛主席遗志的坚定继承者,是坚持毛主席路线的“英明领袖”。华国锋处心积虑地对邓小平复出加以阻挠,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意图。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讨论。

3.“两个凡是”与中国社会心理

“两个凡是”最直接、最表面化的目的就是维护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包括他的晚年错误。本来,经过 1975 年的全面整顿,经过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经过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广大干部群众已经初步从“左”的思潮中解脱出来,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此时带有明显“左”倾色彩的“两个凡是”,却仍然为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种心理的形成,又是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曾经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以皇帝为中心,以皇权为至尊的心理状态。君就是国,国就是君,“忠君”、“爱国”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因此,人们在对天下大治的渴望中,首先寄希望于“明君”、“清官”,重视某个人或某个权力集团对社会的影响,而忽视社会制度本身对政治运行的作用,对社会、国家发展的影响。这种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在现代中国,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卓越领导者,很自然地成为党的化身而受到人民群众的崇高爱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种朴素的感激之情,在长期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被逐渐强化,最终发展成为盲目的个人崇拜。

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体领导。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93 页。